

上海导游小丛书

鲁迅纪念馆

鲁迅故居·鲁迅墓

周 国 伟



SHANGHAI DAUYOU

责任编辑：邹道龙
封面设计：
绘图：彭天皿

鲁迅纪念馆·鲁迅故居·鲁迅墓

周国伟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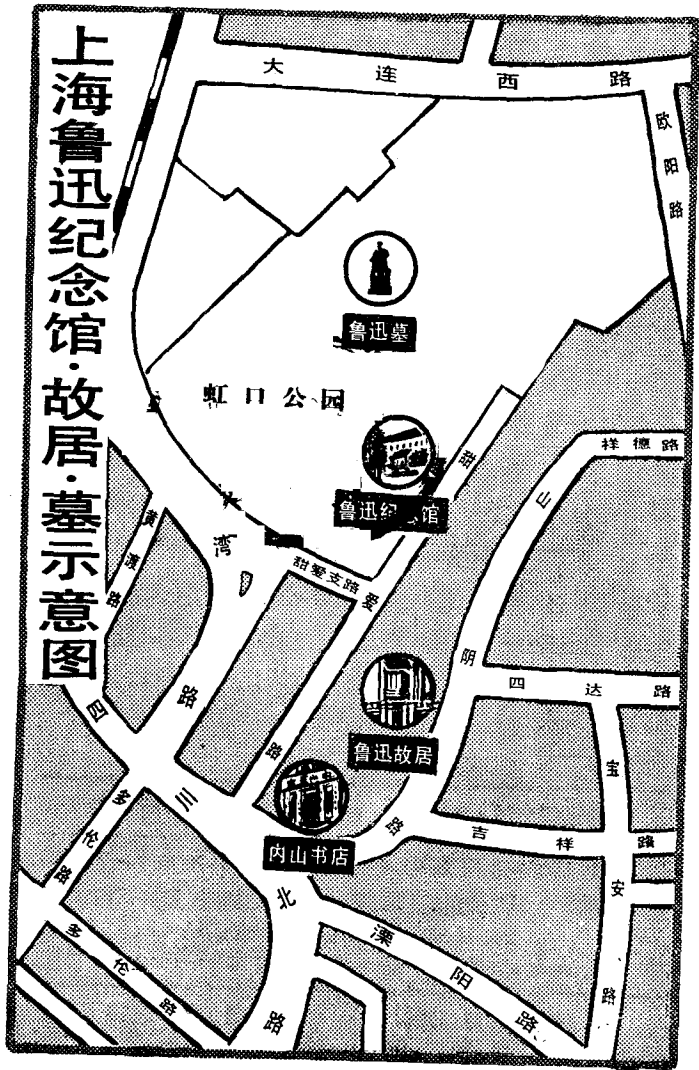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0.875 字数 16,000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20,000册

书号：12077·3025

定价：0.13元

上海鲁迅纪念馆·故居·墓示意图





东海之滨的上海，是鲁迅先生晚年生活和战斗的光荣城市。

鲁迅后期在上海的十年，是他一生中最艰苦而又最光辉的十年。为纪念鲁迅，发扬鲁迅的精神，五十年代初，建立了上海鲁迅纪念馆，恢复了鲁迅故居，迁建了鲁迅墓。这些纪念场所，庄严、朴实，中外闻名，前来瞻仰的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，络绎不绝。

鲁 迅 纪 念 馆

在虹口公园的绿树丛中，有一座造型简洁、朴实、雅致，具有鲁迅故乡绍兴民居风格的两层口形建筑，这就是上海鲁迅纪念馆。

鲁迅纪念馆建于一九五一年一月。馆址初在鲁迅故居之左——大陆新村十号。一九五六年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，在虹口公园内建造新馆。

虹口公园位于东江湾路上，距大陆新村鲁迅故居步行约十分钟。鲁迅生前，曾来园散步。在规划建设新馆时，公园内的其他设施，也相应作了总体规划：目的是“要能真实地表达鲁迅先生的英勇刚毅的性格，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热爱人民、谦逊朴实作风，因之设计要求朴素大方，庄严而不夸大，雄伟而又平易近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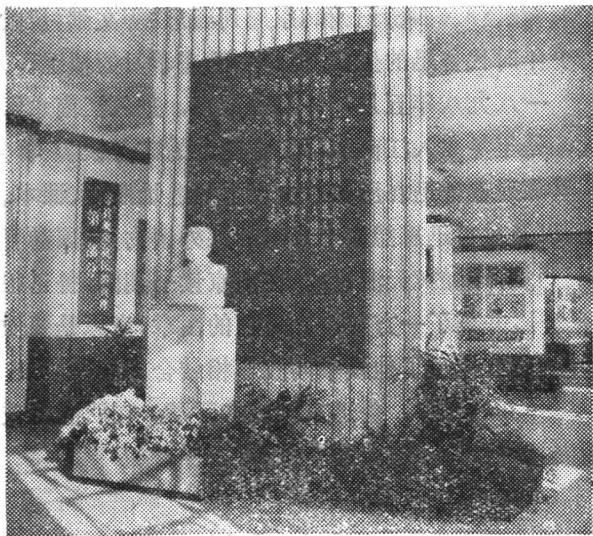
古老的虹口公园，已有七十余年历史。现有面积338亩，绿地面积占三分之二。植有乔木、灌木一万六千余棵，大多是长青树，亦遍植四季相继吐花的各种花木。春天的桃花，秋天的桂花，冬天的腊梅等，皆是鲁迅所喜爱。馆的北面，植有成片桃树，象征青年的导师鲁迅，桃李满天下。由于园林工人的辛勤劳动，匠心点缀，公园已别具特色，成为群众憩息和文化活动的场所。

进公园大门，右折向前，就能望见馆的建筑外形：鲜明的白色墙面，朴素的青灰色瓦顶，马头式的山墙，缘环式漏空的柱廊栏杆，毛石的勒脚，具有浓厚的乡居风味。馆的建筑面积，为2659平方米。馆名“鲁迅纪念馆”为周恩来同志题字。

步入纪念馆，来到二楼陈列大厅，映入眼帘的便是汉白玉的鲁迅胸像。在精心制作的别具一格的奶白色屏风上，是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评价：

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……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”（毛泽东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）

瞻仰鲁迅神采，默诵毛泽东同志的教导，令人肃



鲁迅纪念馆陈列室内景

顾八纮摄

然起敬！

陈列的展品，有鲁迅的手稿、遗物、文献、照片和艺术品等，共一千七百余件，分四个部分，系统地介绍了鲁迅的生活概貌、思想发展和战斗历程。

第一部分：《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》(1881—1918)，设三个组，概要地介绍鲁迅在青少年时期的学习、工作和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爱国主义思想。

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，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里。绍兴的古迹，鲁迅诞生的新台门小堂前，著名的百草园、“三味书屋”，鲁迅的外婆家安桥头和出入的当铺和药铺，都陈列着照片、实物和模型；还有鲁迅少年时期喜爱的读物《鉴略》、《山海

经》、《花镜》、《西游记》和《东周列国志》等文献，反映了青少年时代鲁迅的生活、爱好和勤奋学习的情况。

一八九八年五月，鲁迅去南京，进入江南水师学堂，是年冬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。这里陈列着鲁迅在所在学校读书的遗址照片、课本、笔记，以及对鲁迅思想颇有影响的课外读物，英国赫胥黎著、严复译述的《天演论》。在南京读书期间，鲁迅很爱好骑马，并刻了一方“戎马书生”的图章，意思是要做骑马的书生，体现了他读书同战斗相结合的思想。

一九〇二年，鲁迅东渡日本留学。在明亮的玻璃橱内，陈列着一幅《自题小像》诗：

“灵台无计逃神矢，风雨如磐暗故园。
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

这首题在鲁迅剪掉发辫照片背面的诗，表达了他誓将一生献身祖国的意愿。

在《弃医从文》的油画下，陈列着鲁迅在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时看过的幻灯片。坐在那阶梯式黑屋里的鲁迅，从幻灯片上看到一个中国人，在日俄战争时被指为“侦探”而斩首，周围的看客虽体格健壮，却精神麻木。他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遭到的不幸而痛心，并愤然离开教室，深感最重要的是改变人民的精神，于是走上从事文学的生涯。

一九〇九年，鲁迅从日本回国。先后在杭州、绍兴任教。一九一一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鲁迅曾以极其兴奋

的心情迎接这个革命的到来。在绍兴光复前，他召集学生组织“武装演说队”，上街宣传。一九一二年春，鲁迅应邀到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。是年五月，又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往北京。不久，鲁迅眼见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攫取，感到很苦闷，一面研究历史，搜集整理古籍，一面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。

第二部分：《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》(1918—1927)，也设三个组，介绍鲁迅在北京、厦门、广州的战斗历程及其思想发展。

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。一幅大型版画，展示在眼前。他，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“新世纪的曙光”；他，遵奉“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”，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呐喊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等著名小说，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。《呐喊》和《热风》，是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和第一本杂文集，记录着鲁迅在“五四”时期的战斗业绩。



新文化运动英勇旗手——鲁迅(版画)

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六年，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

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书，他一面不辞辛劳地教育青年一代，一面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。他写下了抨击帝国主义、北洋军阀及其帮凶的杂文集《华盖集》及《华盖集续编》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，鲁迅离开了北京，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。翌年一月，鲁迅抵广州，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。展出的《响导》、《做什么》、《少年先锋》、《支部生活》等珍贵文献，反映了鲁迅与党有了更多的联系。陈列的一张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组必修科目的选课表，上面记载着学生选读的科目和人数，颇发人深思。鲁迅讲授的《文艺论》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选读的学生有二百余人，少的也有七十余人，而其他教师所授科目，一般仅有三十至五十人，可见，学生是多么爱听鲁迅的讲课啊！一九二七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鲁迅撰写了许多文章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行，并从血的教训中，重新认识了原来相信的“进化论”。他说：“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。”

第三部分：《伟大的共产主义者》(1927—1936)，设九个组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鲁迅在上海的战斗业迹。

鲁迅到上海后，开始了后期的战斗生活。在一只大型玻璃橱内，陈列着许多遗物——鲁迅学过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唯物史观要约》、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、《史的唯物论》等，以及翻译介绍的《艺术论》、《文艺与批评》、《文艺政策》等文艺理论著作。他说：“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，都可说明。”一本日文《马克思读本》，鲁迅历时半年，用它辅导许广平同志学习，并

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。他们患难相助，体现了“以沫相濡”的情谊。

《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》油画，陈列在展品的正中。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，鲁迅在“左联”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演讲——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，这是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战斗纲领。

这里还集中陈列着“左联”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宣言、纲领、决议等文献。

这里还集中陈列着“左联”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宣言、纲领、决议等文献。

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，上海左翼文化工作者，借荷兰西菜室，为鲁迅秘密举行五十寿辰纪念会。美国友人史沫特莱，为鲁迅摄



了一张神态亲切、慈祥的“五十岁纪念照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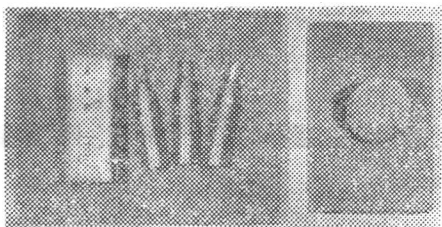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“五十岁纪念照” 史沫特莱摄
(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摄于荷兰西菜室)

了一张神态亲切、慈祥的“五十岁纪念照”。鲁迅非常喜爱这帧照片。

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在粉碎反革命文化“围剿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，却正在这一“围剿”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。

鲁迅的“金不换”毛笔，似匕首和投枪，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。陈列的文献和鲁迅的战斗篇章，批判了各种文艺派别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攻，控诉国民党政府屠杀革命作家和进步人士的罪行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，并积极支持国际反帝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。

鲁迅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。他举办的新兴木刻讲习班，版画展览会，搜集和编辑出版的各种画集，指导青年木刻工作者的通信，搜集的中外版画，都陈列着以上内容的珍贵文献。睹物思人。人们无不为鲁迅的辛勤劳动而钦佩！一九八一年九月，日本朋友内山嘉吉先生在参观纪念馆时，看到展出的一盒日本木刻刀，就亲切地说：“那时，我同鲁迅先生说，这种木刻刀，在日本是学生用的，成年人使用不一定合适。鲁迅先生笑笑说，成年人也可以用，也可以刻出好作品。”从此，内山嘉吉从日本带来了木刻刀，在内山书店出售。鲁迅也添置一盒，以作介绍之用。



鲁迅收藏的日本木刻刀及拓印工具

鲁迅说：“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，相关心。然而最平正的道路，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”（《呐喊》捷克

译本序言》)。陈列的文稿、遗物和照片,集中地体现了鲁迅与内山完造、增田涉、A·史沫特莱、E·斯诺和伊罗生等的交往和情谊。鲁迅遗物中的一件绸长衫,就是用史沫特莱赠送的绸料所缝制。半个世纪已消逝,而这件绸长衫,却成了他们友谊的见证。

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,鲁迅“起看星斗正阑干”,与中国共产党人心心相通。他不顾个人安危,为党转递文件,为共产党人转接组织关系,成了党所信赖的同志。展出的文物、史料,突出地体现了鲁迅对党的热爱。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,胜利到达陕北后,鲁迅热情致电:“在你们身上,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”;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,鲁迅表示拥护,“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”;当托派匪徒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,攻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,鲁迅写了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》,表达了对党的崇敬和信赖。

紧张的战斗,艰苦的环境,使鲁迅的健康受到极大损害。鲁迅病重,宋庆龄闻讯,立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,劝鲁迅住院疗养。这里陈列着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宋庆龄写的这封亲笔信。鲁迅不愿离开自己的岗位,直到逝世前一天,还在执笔。展出的鲁迅逝世前夕写的最后一篇文章、最后一封书信、最后一篇序、最后一天日记,记载着鲁迅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的不朽功绩。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,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终年五十六岁。上海民众献的、由沈钧儒手书的“民族魂”旗,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。



宋庆龄给鲁迅的信

“民族魂”三个字高度概括了鲁迅的精神！这种精神，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！

第四部分：《永远活在人们心中》，陈列着纪念鲁迅、学习鲁迅、研究鲁迅的史料和照片。各种书刊和纪念资料，象征着鲁迅的精神在发扬光大。鲁迅留下七百余万字的精神财富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思想武器。“学鲁迅的榜样，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‘牛’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纪念馆建立以来，前往参观的各界人士无不想买几件纪念品，留作纪念。现在，纪念馆设立了卖品部，出售鲁迅的各种诗轴和遗物的复制品，以及其他纪念资料，供大家选购。

鲁迅故居

位于虹口公园东南向的山阴路（原名施高塔路）上，有一群砖木结构、红砖红瓦的三层建筑，其中的大

陆新村九号，便是鲁迅最后三年半居住的所在——上海鲁迅故居。

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，鲁迅来沪后，由于环境险恶，他在上海先后搬过三个住所。十月八日定居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（后又迁入同弄十八号和十七号）。在这里度过了两年七个月的不寻常岁月。

景云里，是一条貌不惊人的普通弄堂。石库门、青砖墙，在上海都能找到它的影子。然而，这又是一条不平常的弄堂。半个世纪以前，伟大的文豪鲁迅，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。茅盾、柔石、冯雪峰、叶圣陶、周建人等一些著名文化人士，也曾在这里住过。因此，景云里这条普通弄堂，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是有一定意义的。

在景云里期间，鲁迅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。一九三〇年春，鲁迅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，于是年五月，迁至四川北路二〇九三号北川公寓（原为北四川路一九四号A·拉摩斯公寓）三楼四室。

在北川公寓居住的三年中，鲁迅秘密会见了从鄂豫皖根据地来沪治伤的陈赓同志。一天下午，陈赓同志来到鲁迅寓所，与鲁迅谈了红军的战斗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建设，一直谈到深夜。谈话时，陈赓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。鲁迅视为珍宝，一直妥为保存。瞿秋白夫妇，因遭反动派的迫害，也曾在这里避居。一九三二年初冬的一个深夜，陈云同志曾来鲁迅寓所，接秋白夫妇，并安全转移。



上海鲁迅故居外景

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，由内山完造用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，租下大陆新村九号，鲁迅在此住至逝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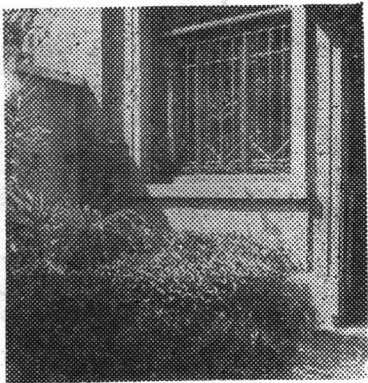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许广平同志的指导下，经过周密调查访问，修复整理，恢复了上海鲁迅故居原貌，于一九五一年一月正式对外开放。一九五九年五月，列为

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现在，每逢鲁迅生日或逝世纪念日前后，接待广大群众瞻仰鲁迅故居，对于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，经过事先联系，亦接待瞻仰。

从四川北路至山阴路，前行三百余米，就到大陆新村。在第一条弄的最后第二幢，门墩上挂有郭沫若手书“鲁迅故居”的题字，便是大陆新村九号。故居的家具图书，大多是鲁迅生前用过的原物。生活气息，一如当年。

步入黑铁皮大门，左边辟有一个小花圃，有鲁迅生前植过的桃树、紫荆花和夹竹桃等。鲁迅是喜爱桃花

的，但他也发出过悲愤的感叹！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，鲁迅致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，去年种了一株桃花，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，虽然少得很，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。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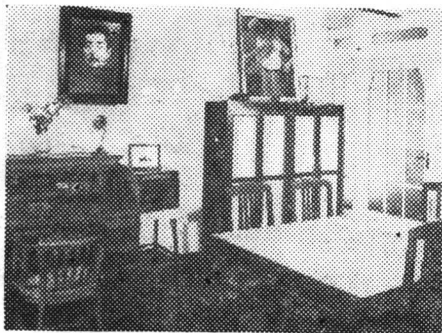


鲁迅故居小花圃

于看桃花的名所，是龙华，也有屠场，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，所以我是不去的。”这里所指的好几个青年朋友，就是李伟森、柔石、胡也频、冯铿、殷夫等五位青年作家。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深夜，他们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。时光的流逝，并不能冲淡鲁迅的悲愤心情。

通过水泥便道，踏上台阶，便是会客室。中间摆着黑漆长方西式餐桌，面铺花纹胶纸板。周围是五把靠背椅子。在那豺狼当道的社会里，鲁迅会客，大多是面朝里，背朝外地坐在靠窗的坐椅上。重要客人，鲁迅预约在内山书店会晤，有时就同客人一起去北四川路咖啡店交谈。

沿着西墙，放着书橱、手摇留声机和瞿秋白去江西瑞金时留在鲁迅家中的工作台；南窗口是许广平用的缝纫机；东墙边挂着《太阳照在贫民窟》的木刻，还放着



鲁迅故居会客室

海婴的玩具橱、小桌椅等。西墙书橱上的那幅油画《读〈呐喊〉图》，是青年画家王钧初赠给鲁迅的。原题为《〈呐喊〉的读者》，鲁迅将题改为《读〈呐喊〉图》，意思更新颖、更贴切了。画的内容，是三人看《呐喊》。构图虽简，寓意甚深，意即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爱读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呐喊》。西墙中央，悬挂着鲁迅五十三岁时所摄的照片。斯诺夫人来故居瞻仰时，看到这张鲁迅像，还不由地引起了欣慰的追忆。因为这张摄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的鲁迅像，就是为斯诺编译《活的中国》而摄的。那时，斯诺曾将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等七篇小说，和其他进步作家的小说一起译成英文，编为英文本《活的中国》。鲁迅为之而摄的这张照片，最初就发表在美国《亚洲》杂志一九三五年一月号上，和斯诺写的《鲁迅——白话文的大师》一起刊出。《活的中国》卷首也刊印了这张照片。

瞿秋白同志的工作台，是一只设计特殊的西式拉门书桌。台面上，有可以推上拉下的软木板。秋白同